

書籍環流與知識轉型

——以岡千仞漢譯西史為中心

葉 楊 曦^{*}

摘 要

岡千仞是活躍於幕末明治時代的儒學者與漢學家。他最為學界熟知的是創作了中國行紀《觀光紀游》，此外在史學領域也頗有建樹。岡千仞不僅撰有史著多部，而且曾與人合作，以漢文翻譯過西方史書。現存四部岡氏譯作包括美、英、法三國國史及英國人傳記一部。本文首先以此四部譯書為中心，討論岡千仞如何運用漢文譯介西洋歷史事件與人物；然後著重從對中國學界影響較大的《米利堅志》與《法蘭西志》出發，結合其在晚清社會的命運，通過書籍環流與知識轉型的視角初步勾勒出岡氏譯著所展現的西方歷史在東亞世界的流播與接受。

關鍵詞：岡千仞、書籍環流、知識轉型、明治漢學、晚清西學

^{*} 作者現任山東大學文學院助理研究員。

On Book Circu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With Emphasis on Oka Senjin'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History in Chinese

Ye Yang-xi

Abstract

Oka Senjin was a Confucianist scholar and Sinologist during the late Tokugawa and Meiji period. Mostly known to the academia for his *Kanko Kiyū* (Eng. Travel Reports for Sightseeing), Oka Senjin was also successful in history. He had not only completed some historical works, but also translated several books about western history by cooperating with others. There are four books translated by Oka Senjin nowadays, including American, Britain and French history and a biography of an Englishma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Oka Senjin'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historical events and persons in Chinese by investigating these books. Especially, more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Oka Senjin's *Meriken Shi* and *Furansu Shi* to analyse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history in modern

East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ok circu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Keywords: Oka Senjin, book circulation,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sinology during the Meiji period, western learning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書籍環流與知識轉型

——以岡千仞漢譯西史為中心

葉 楊 曦*

一、前言

岡千仞（おかせんじん，1833-1914）是活躍於幕末明治時代的儒學者與漢學家。其生平大致可概括為入讀藩校（1833-1851）、求學江戶（1852-1859）、尊王攘夷（1860-1868）、供職東京（1869-1880）與授業雲遊（1881-1914）五個階段。天保四年癸巳（1833）生於仙台，下級藩士岡藏治第五子，祖上世役書記。少時被稱作「讀書家」，曾求學藩校養賢堂與江戶昌平齋，受儒家典籍薰陶，醉心於漢文世界。明治改元之際，因申論尊攘大義，觸怒佐幕派，而被投入

* 本文為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基地規劃課題一般項目（編號16JDGH034）、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國學單列課題青年項目（編號16GZGX15）、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10批特別資助項目（編號2017T100485）、山東省人社廳博士後創新項目專項資金項目（編號201603022）、山東大學青年學者未來計畫項目的階段性成果。本文撰寫過程中蒙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夏曉虹教授，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日本慶應大學合山林太郎教授指導和幫助；初稿完成後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主辦之明清研究學術研討會（2015年12月10-11日）「書籍環流與知識互動——近代中日士人的西學閱讀」專場，蒙主持人潘光哲研究員，評論人韓承樞、陳建守、宋雪博士提出寶貴建議；投稿時復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指正文稿缺失和不足處，敬致謝忱。

獄。天下平定後，被放出，供職東京。歷任公子侍讀、編纂官、修史官，直至東京府書籍館幹事。明治十三年（1880）因不滿藩閥政治而卸任公職，絕意仕進，潛心教書育人，雲遊四方。1884至1885年曾踏訪禹域，著有《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與《觀光游草》三書記錄沿途見聞感受，嚴辭批判中土以煙毒、科舉與貪毒為代表的失政弊俗。大正三年（1914）卒，葬於東京目黑祐天寺。¹

岡千仞治學以經史為主，觸類旁通，筆耕不輟，其中不僅包括《尊攘紀事》、《涉史偶筆》等研究本國國史的史學論著，亦不乏《望雲紀程》、《東旋詩紀》之類文學性較強的紀行作品。此外，岡千仞的學術旨趣並非只囿於傳統文史領域，其著述也有明治維新的時代印記，他用心西學，關注域外大勢。在《觀光紀游》中，作為在野「域外人」，岡氏無所顧忌地表達了對於晚清現狀的看法，並直截了當地以「藥石之語」的形式發表相應的改革建議，雖然不為清廷當局所採，民間知識人士亦眾說紛紜，褒貶不一，卻對近現代中國文士的知識轉型產生影響，故而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佔有一席之地。²這些建議尤以仿效歐美為主，包括變風俗、廢科舉、建學舍、興實學、究格致、講富強等，幾乎就是明治政府為改變幕末黑暗現狀而全盤西化的翻版，是岡氏長期關注西學的結果，得益於其早年的翻譯實踐。

¹ 上述關於岡千仞生平略歷的介紹，主要綜合以下材料而成。宇野量介：《鹿門岡千仞の生涯》（東京：岡廣，1975年）；〈館森袖海翁談岡鹿門先生（附松本奎堂、松林飯山）〉，收於三浦叶編：《明治の碩學》（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頁224-235；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杉村邦彦：〈楊守敬の歸國——岡千仞撰著《觀光紀游》を基にして〉，《書道文化》2007年第3期，頁15-37；張明傑：〈岡千仞游華及其所作遊記〉，岡千仞撰，張明傑整理：《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2。

² 參見拙作：〈「藥石之語」：《觀光紀游》與岡千仞的中國觀〉，收於張伯偉主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9輯（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83-204；〈從「妄論國事」到「好意苦言」：《觀光紀游》在近現代中國的接受、評價及影響〉，收於張伯偉主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1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91-110。

二、自西徂東：岡千仞之漢譯西史

儘管不解洋語，但岡千仞漢學修養頗高，長於漢文寫作，他與通曉洋文的同胞合作，潤色修改譯文，並加入自己對於歷史的認識與評價。現存岡千仞曾經參與翻譯的作品共計四部，內容涉及歐美諸國史事和人物，分別題作《米利堅志》、《法蘭西志》、《英吉利志》與《訥耳遜傳》。四部譯著的合作者爲誰，分別譯自何書，成書與版本狀況又如何？關於這些問題，本章將依次展開論述。

（一）《米利堅志》（1873）

最早在明治六年（1873），岡千仞與同鄉河野通之合譯的《米利堅志》便已獲得版權許可。³前此兩年的明治四年（1871），岡氏任教於東京府立中學，適逢「閉校」「就閑」，便與「善讀洋書」、精通洋文的河野通之共譯美國國史。河野「涉各國史」，選擇首譯此書，因美國爲日本「通交海外」之「嚆矢」。⁴

河野通之（こうのみちゆき，1842-1916），仙台藩醫員河野杏庵（槐陰，1794-1849）次子，⁵字子明，通稱宋賢，號荃汀。⁶不僅爲岡

³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漢文，附日文訓點。和裝，全2冊四卷，第1冊爲卷一至卷二，第2冊爲卷三至卷四。每半頁10行，行20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卷內目錄題作「翻譯米利堅志」，上書口作「米利堅志」，下書口作「光啟社刊行」。

⁴ 岡千仞：〈米利堅志·例言〉，《米利堅志》，無頁碼。

⁵ 岡濯：〈《荃汀遺稿》序〉，收於河野通之撰，河野有編：《荃汀遺稿》（東京：大成社，1922年），頁2a。

⁶ 下中邦彥編：《日本人名大事典》，收於《新撰大人名辭典·第二卷》（東京：平凡社，1939年），頁541。

千仞義弟，⁷亦與之「爲姻戚，爲師友」。⁸其人「學殖有素」，⁹「儒雅篤行」，其詩「諸體略備，清新淳樸，而有逸氣」，其文「暢達雄渾，與辭賦稍稍殊趣」。¹⁰河野通之承繼義兄河野楊庵（1814-1863）遺業，曾參加重野安繹舊雨社、岡千仞如蘭社。¹¹維新後習英文，出仕參謀本部編纂。除本書外，另與岡千仞合譯《英吉利志》，¹²並與石村貞一合著《支那最近史》、《最近支那史》，分別爲晚清上海譯書局與上海振東室學社續補編印，傳入中土。¹³

《米利堅志》原爲美國人格堅勃斯（George Payn Quackenbos，1826-1881）所著，¹⁴主要介紹自1492年哥倫布首次發現美洲大陸至

⁷ 日下寬：《〈荃汀遺稿〉序》，收於河野通之撰，河野有編：《荃汀遺稿》，頁1a。

⁸ 館森鴻：《〈荃汀遺稿〉後序》，收於河野通之撰，河野有編：《荃汀遺稿》，頁1a。

⁹ 岡濯：《〈荃汀遺稿〉序》，收於河野通之著，河野有編：《荃汀遺稿》，頁2b。

¹⁰ 館森鴻：《〈荃汀遺稿〉後序》，收於河野通之撰，河野有編：《荃汀遺稿》，頁1a。

¹¹ 館森鴻：《〈荃汀遺稿〉後序》，收於河野通之撰，河野有編：《荃汀遺稿》，頁1b。

¹² 館森鴻：《〈荃汀遺稿〉後序》，收於河野通之撰，河野有編：《荃汀遺稿》，頁1b。

¹³ 兩書均始於元明，止於清光緒己未中日戰爭，一仿《通鑑》紀事本末體，一仿編年體，具體評價參見徐維則輯，顧燮光補：《增版東西學書錄》，收於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據清光緒十六年（1890）鉛印本影印，頁50。

¹⁴ 李慶稱：「他還和河野通之合譯了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的《美利堅志》。而慕維廉則是王韜的朋友。這中間的關連是不難推知的。王韜稱其譯作：『視慕維廉所撰言簡而事增』，殆是有所增補。」李慶：《日本漢學史·第1部·起源和確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216。筆者以爲此觀點有待商榷，《美利堅志》的作者並非慕維廉。張斯桂《〈法蘭西志〉序》稱「英人慕維廉譯《英吉利志》」。檢王韜原文，《扶桑遊記》云：「鹿門……近又譯《英志》，已得二卷，視慕維廉所撰，言簡而事增，誠不朽之盛事也。」詳參王韜撰，陳尚凡、任光亮校點：《扶桑遊記·卷上》（長沙：嶽麓書社，1982年），頁201。另據現今諸家圖書館所藏古籍書目，亦可知慕維廉所譯當爲《大英國志》（即張斯桂所稱《英吉利志》，王韜所稱《英志》），而非《米利堅志》。關於此書的

1860年日本公使訪美368年間的美國歷史。¹⁵除 Quackenbos 原書外，亦旁採《瀛環志略》、《聯邦志略》、《萬國公法》、《格物入門》等加以補充。

(二)《法蘭西志》(1878)

關於翻譯西書，岡千仞原意自美國始，「以次及英佛諸國史」。但在完成首部譯書後，河野退居鄉里，岡氏亦「出仕文部省」，轉任十一等編修寮教科書編纂，因無力譯及他國而引以為憾。但這種遺憾並未持續太久，五年後，岡氏的第二部翻譯作品《法蘭西志》刻成。此書合作對象換成通曉法文的高橋二郎。與《米利堅志》不同，此書封面署「高橋二郎抄譯」，扉頁則作「高橋二郎譯述，岡千仞刪定」。¹⁶《法蘭西志》的翻譯最初源自法國史學家本的內氏（ホンテヌニ）的勸勉，高橋綜合三部法國史書，譯為一編，再由岡千仞刪定，並加諸論贊。

《法蘭西志》抄譯者高橋二郎（たかはし じろう，1850-1917），千葉縣南總來里（今久留里）人，別稱弘。¹⁷與岡千仞同出昌平黌，曾任東京高等蘭英學校教授。¹⁸除《法蘭西志》外，編著有《啟蒙日本雜誌》（1874）、《耶穌教新論》（1882，1884年有市川鯤之助《校補耶穌教新論》）、《昌平大學職員及同窗名簿》（1893）等。

研究，參見鄒振環：《〈大英國志〉與晚清國人對英國歷史的認識》，《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頁40-49。

¹⁵ George, Payn Quackenbos, *Prim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D.Appleton & Co., 1864).

¹⁶ 高橋二郎譯述，岡千仞刪定：《法蘭西志》（東京：露月樓，1878年），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漢文，附日文訓點。和裝，全3冊六卷，上冊為卷一至卷二，中冊為卷三至卷四，下冊為卷五至卷六。每半頁10行，行20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卷內上書口作「法蘭西志」。

¹⁷ 宇野量介：《鹿門岡千仞の生涯》，頁248。

¹⁸ 高橋二郎編：《昌平大學職員及同窗名簿》（東京：忠愛社，1893年），頁5a。

《法蘭西志》涵蓋公元前481年「克魯味王建法蘭西國」¹⁹至1852年「侖（筆者按：即拿破崙）三世即帝位」²⁰共兩千三百餘年（〈附言〉作「一千五百年」²¹）間的法國歷史。封面標題為《（猶里氏原撰）法蘭西志》，在〈附言〉中，高橋二郎交待此書譯自猶里氏的《法國史要》（1866）、《近古史略》（1869）與《法國史》（1870）三書，並「提其大要」，由岡千仞刪定而成。²²因高橋氏中途「適病廢筆硯」，岡千仞取其底本，「參考諸家譯書」，補充勃拿巴兒土氏之紀。

（三）《英吉利志》（1878?）

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現藏《英國史殘稿》一部，該文庫是目前保存岡千仞舊藏的兩大機構之一，²³其館藏目錄注明此書為「千村芝溝譯，河野通之編，岡千仞校」。²⁴據筆者目檢，此本為和裝，包以墨綠色封皮。封底有橢圓形東京都立日比谷圖書館藏書印，日期為昭和46年（1971）3月26日，番號為0165500。此書現請求記號為「特4018」，凡16頁，用紙不一，或為藍行紙，或為藍格紙。扉頁題「英國史殘稿」五字，部分頁為清稿，其餘頁有朱、墨兩筆刪改增點。

¹⁹ 高橋二郎譯述，岡千仞刪定：《法蘭西志》，頁1a。

²⁰ 高橋二郎譯述，岡千仞刪定：《法蘭西志》，頁21b。

²¹ 高橋二郎：《法蘭西志·附言》，《法蘭西志》，頁1a。

²² 所據三書即 Victor Duruy, *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ules jusqu'à Nos Jours; Histoire des Temps Modernes, depuis 1453 jusqu'à 1789; Histoire de France*。參見拙作：《〈法蘭西志〉的漢文譯介與書籍流轉》，《漢語言文學研究》2015年第2期，頁65-66。

²³ 陳捷：〈岡千仞與訪日中國人的交遊——《蓮池筆譚》、《清讌筆話》等筆談資料之所見〉，收於氏著：《人物往來與書籍流轉》（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06-107。日文原文載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頁95、頁139注48。

²⁴ 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岡千仞舊藏資料目錄，網址：http://www.library.metro.tokyo.jp/edo_tokyo/tokubun_guide/kaiage/tabid/994/Default.aspx，檢索日期：2017年2月14日。

就具體內容而言，此書次序雜亂，「有頭無尾」。《英吉利志》之卷首位於《英國史殘稿》之卷中，該頁用藍格紙，每半頁10行，行20格，有天頭行，書口作「舊雨社」。自右至左分別作「英吉利志卷一」、「東京府 千村芝溝口譯」、「宮城縣 河野通之筆述」、「岡千仞刪定」，則知此書一名《英吉利志》，上文館藏目錄所載或即據此而來。

《英吉利志》從公元前55年開始講起，以〈不列顛風俗〉為全書首篇，將英吉利種族溯源至不列顛，在未建國之前，稱以「蠻種」、敘其「蠻俗」。「林莽被野」、「不解架構」、「噉生肉」、「不知播織」、「畫皮膚」等表述或可看作是與現代「文明」相對立的「野蠻」表現。²⁵而教法「德雷斯」出現後，教長「制法律」、「製藥餌」、「造兵杖器」及「賦詩」的舉動則是逐漸開化的進步表徵。

1879年，著有《普法戰紀》一書的王韜（1828-1897）應郵便報知新聞社主筆栗本鋤雲（1822-1897）等人之邀東遊，旅行之際，於日本報刊上發表見聞感受。同年，相關文字題作《扶桑遊記》結集出版。此書卷上有言：「鹿門……近又譯《英志》，已得二卷，視慕維廉所撰，言簡而事增，誠不朽之盛事也」；在介紹新近結識的友人岡千仞時曾盛讚其對西土情勢，了然於胸，除已譯《米利堅志》、《法蘭西志》外，正在進行的《英志》亦已完成二卷，篇制小於英人慕維廉《英吉利志》（即《大英國志》）。同時他一再追問「《英志》、《俄志》之撰，何時可成」，²⁶十分期待岡氏能將俄史譯出：「俄志之譯，為不可緩。先生其有意哉？他日《俄志》若成，明著其利弊得失所在，則五大洲可收之掌握中，何等快事！」²⁷1884年9月，岡千仞在北京拜訪李慈銘，後者於日記中談及岡氏譯書時稱：「嘗欲撰英、法、普、俄、米五國志，先成《米利堅志》、《法蘭西志》，已刊行，《英志》亦

²⁵ 關於「野蠻」概念的形成、近代中日之間的交流與定型，參見沈國威：〈「野蠻」考源〉，《東亞觀念史集刊》第3期（2012年12月），頁383-403。

²⁶ 1879年10月14日王韜致岡千仞函，收於鄭海麟輯錄：〈王韜遺墨〉，《近代中國》第9輯（1999年12月），頁137。

²⁷ 王韜撰，陳尚凡、任光亮校點：《扶桑遊記·卷上》，頁201-202。

屬草矣。」²⁸並贈詩稱讚：「況君精乙部，此業冠東方」。²⁹此外，1885年1月22日岡千仞在廣州謁見龔易圖，進行筆談時曾明言：「十年前曾譯米、法、英三史」。³⁰據此，則當時《英志》草稿已成。筆者目前尚未發現岡譯《英志》刊本，清人文稿中提及的《英志》或僅止於「屬草」，並未刻印，故未曾流傳。《英國史殘稿》中並無序跋或凡例之類的文字，惟一可能與此書撰作時代相關的痕跡僅有上引文字所在紙張之書口「舊雨社」三字。按，森槐南編有《舊雨詩鈔》初集二冊，刊於明治十年（1876）。內中錄岡氏漢詩五首，皆作於明治戊辰（1868）。據卷首明治七年（1874）藤野正啟所撰〈舊雨社記〉知，此社伴隨明治政府的建立而成立於蓮塘長酌亭，是明治時代東京地區愛好漢詩文之士結成的「文酒社」，岡千仞屬於創社元老之一。³¹《英國史殘稿》所用部分紙張的書口皆有「舊雨社」字樣，應為岡氏平時參加該社聚會之稿紙。綜合以上討論，筆者推斷《英吉利志》之成書在1878至1884年之間。

（四）《訥耳遜傳》（1887）

《英志》以外，岡千仞另有一部譯書與英國相關，即出版於明治二十年（1887）的《訥耳遜傳》。³²此書全名《軍人必讀訥耳遜傳》，

²⁸ 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己集下》，收於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14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頁10469。

²⁹ 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己集下》，收於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14冊，頁10469。

³⁰ 岡千仞撰，張明傑整理：《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173。

³¹ 關於舊雨社的最新研究成果，請參合山林太郎：〈讀む阪谷朗廬〈舊雨社記〉——明治初期漢詩文壇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收於合山林太郎：《幕末・明治期における日本漢詩文の研究》（大阪：和泉書院，2014年），頁29-38。合山氏使用《郵便報知新聞》所載阪谷朗廬〈舊雨社記〉，解讀出不同於藤野正啟同名文章的另一種「自主自由」態度，反映出該社世俗價值觀與西洋傳入新知識的交織。

³² 內田成道、岡千仞共譯：《訥耳遜傳》（東京：土屋書店，1887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漢文，附日文訓讀。和裝，全1冊六卷，活字本，定

由內田成道在海軍大佐肝付兼行介紹下與岡千仞合作完成。其時適值岡千仞因染毒東歸，養病東京芝公園禪院，內田每天口譯英書一、兩頁，岡氏「自旁筆記」，「三月而成」。《訥耳遜傳》原為英國史學家羅業叟梯（Robert Southey, 1774-1843）所撰，主要介紹英國皇家海軍著名將領訥耳遜，即 Horatio Lord Viscount Nelson 伯爵從 1758 年出生到 1805 年戰死沙場的一生。³³

三、以漢文納西史：岡千仞之翻譯歷史觀

「日本對西方的翻譯始於蘭學，那時主要通過荷蘭文翻譯醫藥學、機械、槍炮等與民生有直接關係的書籍」。³⁴ 明治時代出現西書翻譯達到高潮的盛況，堪稱「翻譯的時代」。³⁵ 另一方面，日本的文學書籍「也包括涉及文明開化的人文著作」。³⁶ 從這種界定上看，岡千仞參與的四部譯著又都屬於明治時代的文學書籍。上一章分別討論了它們的原作者與翻譯者身分、原本與譯本成書和版本狀況等問題，那麼岡千仞在漢譯西史的過程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又表達哪些翻譯理念與歷史觀點？本章將針對其翻譯觀與西史觀進行分析。

（一）岡千仞之翻譯觀

在最早完成的《米利堅志》卷首〈例言〉中，岡千仞便發表了自

價八十錢。卷內目錄題作「訥耳遜傳」。

³³ Robert Southey, *The Life of Horatio, Lord Viscount Nelson* (London: Printed for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841).

³⁴ 王克非：《翻譯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318-319。

³⁵ 王克非：《翻譯文化史論》，頁319。另外，山岡洋一據日本 Webcat Plus 數據庫進行檢索發現 1868-1882 年間日本譯書總數多達 1869 種，故名之曰「大翻譯時代」，參見山岡洋一：〈15 年に數千點——明治初期の大翻譯時代〉，《翻譯通信》2004 年 3 月號，頁 1-3。

³⁶ 王克非：《翻譯文化史論》，頁 319。

已關於譯述原則的見解。他指出翻譯應通曉明暢，斥責洋學者譯述之後不堪卒讀的弊端：

譯述洋籍，務照原書，則其文鬱壘晦澀，或至不可解。是書先得其大意，而後下筆。原書前敘者，或舉之後，詳敘者特提其略，專要使讀者易了其全局。譯述之體，固宜如此。

近時洋學者，專事譯述，刊行書不知數。而一書前後數篇，零丁破碎，漫無體裁。是書雖僅僅四卷，自米國草昧至一千八百六十年，治亂大略，歷歷無遺。此所以與近時譯書異其撰也。³⁷

《米利堅志》首先由河野譯出，隨後岡氏加以潤色，「反復塗抹」，至於卷成。岡千仞認為翻譯西書時，如果採取直譯的形式，嚴格逐字對應原文，那麼會造成譯文生硬晦澀，讓讀者難以理解。因此，他與河野採取了調適的翻譯策略（adaptation strategy），即先讀原著，再行譯述，調整原文前後內容，以求詳略得當，敘述有法，便於讀者通盤把握。岡氏又稱當時洋學者的翻譯數不勝數，但質量堪憂，全無體系，令人不忍卒讀。明治初期翻譯的西方文學書籍並不多，《米利堅志》便是其中之一。

此外，具體到譯述所用專有名詞，《米利堅志》提出一概沿用中國士人的慣用翻譯表述：

其他地名、人名，概用漢土人所譯。其未經譯者，姑以邦音填之。³⁸

也就是說，岡千仞認為，只有遇到中國沒有翻譯先例時，才可選擇日本國語進行音譯。在數年後完成的《法蘭西志》中，他進一步提出：

地名、人名，專用漢人所譯，其未經漢人譯出者，以漢音填

³⁷ 岡千仞：〈米利堅志·例言〉，《米利堅志》，無頁碼。

³⁸ 岡千仞：〈米利堅志·例言〉，《米利堅志》，頁1b。

之。漢人所譯，猶不合西者，況以日本人為之？³⁹

以漢文翻譯西文專有名詞屬於蘭學建立以來的傳統，這段表述裡值得注意的是，岡千仞在《法蘭西志》中以漢音構擬中國士人未曾涉及過地名、人名，取代了《米利堅志》中的和音。從給出的理由上看，中國因素是他考慮的首要選項。從教育背景看，岡千仞本身具備家學淵源，自幼接觸漢籍，曾在江戶昌平齋接受過系統的漢學教育，熟悉漢文，素膺儒術。因而可以說是在「中國文學的世界」裡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對中國有著天然的親緣感。特別是其在1870年代後期與黃遵憲（1848-1905）、王治本（1836-1908）等在日晚清士人經常進行筆談交流，《法蘭西志》也完稿並付梓於此時，岡千仞對中國的認知從此前的書本層面上升到切身的人際層面。此書對於譯名採取上述方法，應當是岡千仞在接觸中受晚清士人影響所致。這一點，從《法蘭西志》刻印前後他與晚清士人進行筆談時表現出的文化傾向與心理認同中便可見一斑。他將自己看成是中國的一部分，認為東亞諸國皆同文同種：

吾雖非禹域人，同是禹域人種中一人。⁴⁰

又認為漢字在東亞地區發揮的作用超過拉丁文對西洋社會的影響，漢學是東亞諸國的唯一學問，具有絕對的排他性主導地位：

洋人之學出於羅馬，所謂羅句語者，英、法、日、俄皆活用此語為各國言語學術。東洋各國，如朝鮮、安南及暹邦，皆用漢字以為國體風俗，猶洋人活用羅句語。然則漢學東洋各國之學，漢學以外，豈有國學者乎？⁴¹

³⁹ 岡千仞：〈法蘭西志·目錄〉，《法蘭西志》，頁2a。

⁴⁰ 劉雨珍編校：《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636。

⁴¹ 劉雨珍編校：《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頁638。

從《米利堅志》到《法蘭西志》，顯示出岡千仞更強的以漢學為旨歸（sinology-oriented）的傾向。這一傾向暗含著岡千仞對其時日本洋學者翻譯西學時弊端（「零丁破碎，漫無體裁」）盛行的對抗意識。1879年3月，岡千仞在與黃遵憲筆談時有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論述：

陋邦洋學盛行以來，譯書汗牛充棟（皆以伊呂波者）。而洋學者未曾學作文，故其書鬱澀不可讀（黃傍注：中村直言不通漢學不能譯洋書，洵然）。故其書隨刊隨滅（蓋無讀之者），其能行於四方者無幾何。⁴²

岡千仞將中國視作自己的「文化母國」（cultural motherland），面對洋學盛行、全盤西化帶來的時代挑戰，他以漢文翻譯、漢音構擬等形式體現著對抗意識，表現出所持有的延續漢學傳統、維護漢學地位的文化保守主義價值姿態。

（二）岡千仞之西史觀

在歷史評價方面，《米利堅志》中岡千仞於卷四「布堪南為大統領」條末以「論曰」諸語總結全書，採取傳統儒家孔孟之道的價值評判姿態，揭示美國富民強邦、文明開化的崛起之路。他讚歎華盛頓定下「四年更立之法」的功績：將華盛頓不忍國民受虐，自然流露出的情感之真誠與戰國時期齊桓公、晉文公「假名仁義」之虛偽兩相對照，突出其深得民心的形象，同時也褒揚華盛頓對自己定下的政制、法制能夠嚴格執行。最終將美國的文明開化歸功於華盛頓一人之力，視其為中國上古虞舜之類的賢君英雄：「頓之盛德大業，駢稱之唐虞，殆無大慚也」，⁴³「孟子頌舜德曰『立賢無方』，如頓其殆亦孟子所謂『無方者』也歟？」⁴⁴

⁴² 劉雨珍編校：《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頁639。

⁴³ 岡千仞：《米利堅志》，頁28b。

⁴⁴ 岡千仞：《米利堅志》，頁29a。

而《法蘭西志》，「書中論贊，係於鹿門氏筆」⁴⁵（《法蘭西志·附言》）。與《米利堅志》只有一處論贊不同，《法蘭西志》諸卷卷末皆附有岡氏論贊。首先，他延續《米利堅志》中以儒家批評準則評價歷史人物的做法，如卷二末尾引用《萬國通鑑》，將首創國會的泰甫帝比作歐洲堯舜。又如卷五結尾引用《論語·子路》「一言喪邦」，批判路易十四所言「政府即我，我即政府」⁴⁶之傲慢態度。再如卷六所附「論曰」⁴⁷總結拿破崙一生，與「禹之行水」相比較，得出「古來英雄用兵立大功於天下者，必用諸於不得已者也」的結論，同時又以「秦並六國」、「晉並三國」，說明拿破崙之敗「皆由用兵不得其道」。其次，這些論贊又可以補充其在《米利堅志》中對待西洋史學的態度與思想觀點。一方面，他推崇西方自由、民主與法治的先進制度。如其卷二論贊認爲歐洲各國得以「駸駸乎日進文明之域」，原因主要在於「以議會爲張治化之基本」。⁴⁸又如卷三文末談及路易九世維護民權與腓力四世討論國人自由權利時深有感觸，從而對比中西法律及政府、人民與國勢的關係，準確扼要地把握住問題的實質，切中肯綮，發人深省。再如卷五指出「欲其國之永安久治」，正確的態度應該是「以製國憲，定君民權限爲第一義也」。⁴⁹另一方面，他在評價西方歷史人物時，又與本邦先人相比附。卷六最後便稱日本豐臣秀吉（1537-1598）與拿破崙「異其成敗者，無他，其經營四方，先智略，而後用兵也」。這也是岡千仞協助譯述此書的用意所在，與其尊攘之意相關，以區別於通行洋學者。天頭批語中引述其語可佐證之：

天爵草是篇，以稿本示余，疑引豐公頗不倫。天爵笑曰：「我苦心點出豐公，以結是篇，亦尊內賤外之意，不然何異尋常洋

⁴⁵ 高橋二郎：〈法蘭西志·附言〉，《法蘭西志》，頁1a。

⁴⁶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27b。

⁴⁷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21b-23a。

⁴⁸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10a。

⁴⁹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28b。

學者流？」譯洋書者，亦可以知用心細密也。⁵⁰

明治時代，日人多將拿破崙與本國豐臣秀吉互相比附，《法蘭西志》譯者所論與卷內眉批均可見此用例。另外，岡千仞站在本民族立場上，對豐臣秀吉當年征朝之「神功」褒賞有加，認為其所為不過是此前忽必烈所為而已，肯定其保障了國家日後的長治久安：「我邦表立東海，四鄰震懾，坐保三百年無事者，實由此役耀國威於海外」。⁵¹

《英吉利志》亦以「論曰」諸語總結全書：

論曰：英自薩索三世而上，無一足言者。所謂不列顛者，不過蠡爾土蠻，聚舊邦部落耳，而國運駸駸，不出千年，致今日之強盛，豈非以其民苦寇賊，艱衣食，磨礪頑鈍，發憤勵精，遂能感發天良，以創立磐石不拔之國基之故耶？蓋英國地勢，背大陸，面洋海，當四方往來之衝，所謂天時者。苟使國立富強之根本，以待天下之有事，則建瓴屋上之勢。其致今日之強盛，殆非偶然也。抑我邦立國，先英殆一千二百年。彼以蕞一蠻種，能致今日之強盛，而我邦以地靈人傑，神人之所福，疆域不加大，勢力不加強，豈以其背大陸，面洋海，當四方往來之衝，不如英不得其地勢也歟？將以我之固守陋規，恬然自劃，不如英人奮發勵精，以創立盤石不拔之國基也歟！噫！⁵²

岡千仞認為，英國從「蠡爾土蠻」到「今日之強盛」「不出千年」，「殆非偶然」，不僅有天時之利，更多是其國民「磨礪頑鈍，發憤勵精」的結果。他進而探討本國的情形：日本有著類似的先地理優勢，先於英國1200年立國，但由於「固守陋規，恬然自劃」，因而不能如英國般在千年內開拓疆域，加強勢力，從「蕞爾一蠻種」走向富強。

⁵⁰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22b-23a。

⁵¹ 岡千仞：〈論豐臣氏征朝鮮〉，收於岡千仞著，岡百世編：《藏名山房文初集·卷四》（大崎町：岡百世，1920年），頁29b。

⁵² 千村芝溝譯，河野通之編，岡千仞校：《英吉利志》，無頁碼。

在翻譯《訥耳遜傳》前，岡千仞曾譯有三部歐美國史，對西方歷史已有所瞭解。此書雖屬自傳，並非國史，但岡氏兩三年前曾赴華遊覽，觀念一變，書中見地亦更為深入。尤其是在華期間所發生的中法馬尾海戰讓其觸動不已。其時，法軍只用了十五分鐘時間便將清軍擊潰，因而岡氏「慨然有感於宇內兵勢一變」。⁵³ 人們都推稱「歐洲兵制為精煉無雙」，⁵⁴ 但卻不一定知道其強盛之因。歐洲之中，英國海軍又強於法、俄，為天下稱道，而其又「以訥耳遜為第一」，⁵⁵ 此為作者譯述之動機目的所在。各篇末附「譯者曰」，為岡氏「泛論時事」之語。卷六〈遜戰死〉篇末「譯者曰」總結全書，認為訥耳遜「神於用兵」，因其兵為人世間之「抵抗力」，「天降遜於英國」與拿破崙抵抗，「於是以前海為用武之地，以大艦巨炮為決雌雄之具」。最後總結出「兵奏神功於天下也久矣」，這是那些視「兵凶器戰」為「危事」之人所無法理解的。⁵⁶ 這也沿襲了譯者在《法蘭西志》中的觀點：岡千仞對於用兵功用的看法集中於該書卷四之論贊部分，他首先稱「凡物有抵抗力，而後可以神其功用也」；⁵⁷ 進而引申至用兵如能「振起人民抵抗力」，便可產生功用。因而他能別出新意地從功用之於天下的角度，反面論證一般帶有負面含義的凶器亦可以「祥雲慶星」⁵⁸ 的面目出現。

四、東西流傳：岡氏譯著之閱讀反響

最近三十年，歐美書籍史研究開始擺脫純技術、純物質的觀念，

⁵³ 岡千仞：〈訥耳遜傳·序〉，《訥耳遜傳》，頁1。

⁵⁴ 岡千仞：〈訥耳遜傳·序〉，《訥耳遜傳》，頁1。

⁵⁵ 內田成道、岡千仞共譯：《訥耳遜傳》，頁3。

⁵⁶ 內田成道、岡千仞共譯：《訥耳遜傳》，頁209-210。

⁵⁷ 高橋二郎譯述，岡千仞刪定：《法蘭西志》，頁20b。

⁵⁸ 高橋二郎譯述，岡千仞刪定：《法蘭西志》，頁21a。

日益關注書籍在「人類溝通和文化轉移」⁵⁹ 方面的意義。而在「新文化史」語境下，西方學界通過閱讀史的視角關照這些意義，取得了頗為豐碩的成果。⁶⁰ 受此影響，學界在中國明清書籍史與閱讀史上進行的研究亦蔚為大觀。⁶¹ 而之前的東亞書籍史研究則側重單向度的漢籍「東傳」或「回流」，卻少見錯綜曲折的「環流」。⁶² 按照張伯偉先生的理解，「書籍環流」包括「書籍本身在傳播中的多向循環，書籍內容的閱讀、接受並反應的互動，以及由此引發的觀念和文化立場的變遷」。⁶³ 他近年完成的三篇論作便是這一觀念的實踐。⁶⁴ 另一方面，漢語學界在近年出現首部閱讀史專著，潘光哲先生所著《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以閱讀為中心點貫穿「關乎書刊、資訊、知識觀念之傳播接受的各個歷史面向」，⁶⁵ 「展現人物、書報、出版之間的複雜關係和多樣風華」。⁶⁶ 本章則希冀結合書籍史與閱讀史的研究方法，從書籍環流的角度切入討論岡氏譯著，特別集中於其來華前完稿的《米利堅志》與《法蘭西志》，關注明治與晚清士人的閱讀、接受和反饋，以及岡氏譯著帶給他們的思想衝擊與知識轉型的可能。

⁵⁹ 張伯偉：〈書籍環流與東亞詩學——以《清脾錄》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2期，頁164。

⁶⁰ 參見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頁35-37注82。

⁶¹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頁14。

⁶² 張伯偉：〈書籍環流與東亞詩學——以《清脾錄》為例〉，頁164-165。

⁶³ 張伯偉：〈書籍環流與東亞詩學——以《清脾錄》為例〉，頁165。

⁶⁴ 除〈書籍環流與東亞詩學——以《清脾錄》為例〉外，張伯偉另有〈明清時期女性詩文集在東亞的環流〉，《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頁95-106）與〈明清之際書籍環流與朝鮮女性詩文——以《蘭雪軒集》的編輯出版為中心〉，《漢字漢文研究》（2015年第10號）兩文。

⁶⁵ 徐佳貴：〈書評：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9期（2015年9月），頁190。

⁶⁶ 宋雪：〈書評：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漢學研究》第33卷第2期（2015年6月），頁276。

(一) 近代中日士人之序跋評點

《米利堅志》完稿後，岡千仞之友人題寫序跋相贈。川田剛於序中稱贊岡千仞「好學能文，所見超流俗」，⁶⁷ 認爲「善讀斯書，則能知米之所以爲米，而我之所以爲我者」。⁶⁸ 中村正直與藤野啟亦分別在序跋中闡述此書在介紹西方民主政體上對於日本的借鑒意義。岡千仞亦頗爲關注清人對此書的評價。付梓刻印後，特意託赴華友人小牧昌業（1843-1922）寄諸駐華公使柳原前光（1850-1894），「請諸名流評閱」。⁶⁹ 柳原輾轉交給了京師同文館總教習，美國人丁韞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後者則再次易手，囑其同事兼好友同文館天文算學總教習，曾與偉烈亞力共譯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李善蘭作序，最後再託鄭世寧遞還岡氏。岡氏對李序頗爲珍重，《米利堅志》出版後，復「命工模刻，冠之卷首」，⁷⁰ 其自豪之情溢於言表：「區區陋著猶辱支那名流賞鑒，不特陋著之榮，抑亦東亞藝文日盛之兆。」⁷¹ 此文最初發表於丁韞良創辦的《中西聞見錄》，⁷² 次年又被美國傳教士林樂知（John Allen Young, 1836-1907）主編的《萬國公報》轉載。⁷³ 李氏於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孟冬寫就序言，其中感歎「天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強調英雄人物在社會發展中起到的作用。對「傳賢不傳子」、「四年一易」的美國政治體制讚賞有加，以爲美、中皆有非常之人（華盛頓、堯舜）。李氏特別提及日本天皇正在主導的明治維新，大到國制，小到民生，「一以西國爲法」，因而反問「譯此書者亦別有微意乎」。⁷⁴ 岡氏則於眉批

⁶⁷ 川田剛：《〈米利堅志〉序》，《米利堅志》，頁2b。

⁶⁸ 川田剛：《〈米利堅志〉序》，《米利堅志》，頁3b。

⁶⁹ 岡千仞：《〈李善蘭〈米利堅志〉序〉誌》，《米利堅志》，頁3a。

⁷⁰ 岡千仞：《〈李善蘭〈米利堅志〉序〉誌》，《米利堅志》，頁3b。

⁷¹ 李善蘭：《米利堅志·序》，未附岡千仞識語，岡千仞、河野通之同譯：《米利堅志》（東京：光啟社、博聞社，1873年），頁3b。

⁷² 李善蘭：《〈米利堅（即美國）志〉序》，《中西聞見錄》第28號，頁3a-4a。

⁷³ 李善蘭：《〈米利堅（即美國）志〉序》，《萬國公報》第322號，頁303a-303b。

⁷⁴ 李善蘭：《〈米利堅志〉序》，《米利堅志》，頁2b。

謂此句「不知何所指，將質之李先生」。⁷⁵雖然日後，即使是遊華期間，岡氏與李氏再無交集，但聯繫李序上下文意可知其對日人翻譯《米利堅志》用心的體認：一是「一以西國爲法」的日本明治天皇亦屬「非常之人」；二是傳賢傳子固無定例，回歸了「三代之治」的傳統理念。⁷⁶

《法蘭西志》卷首岡松辰所撰序文力主藉鑒西方「設教施政」、「體國經野」之制，重現唐虞三代之治。龜谷行序言亦推崇法蘭西諸方面之文明，強調拿破崙的功績，肯定其所訂法律，並以其爲此書譯述之由，但又對法律與文明的關係心生疑竇。卷末木原元禮的跋文首先批評「華人詳內而略外，侈乎文而儉乎實」，⁷⁷指斥中土史官矇於外勢，既而引出岡氏譯述《法蘭西志》，期以富民強邦之義。他認爲《法蘭西志》本書在筆法與內容上都較其前譯《米利堅志》更爲精彩。由此可以窺見岡氏「欲警勵人之意，可謂勤矣」。⁷⁸希望他日能被讀者接受，以爲「守禦攻取」⁷⁹之備。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副使張斯桂（1816-1888）與隨員沈文燾（1833-1886）讀罷此書，亦曾撰序相贈。道光以降，英、美諸國國志皆有譯介，獨法蘭西闕如。1878年夏，岡千仞、高橋二郎攜譯書問序於張氏。通過此書，他方才首次瞭解到法蘭西「其國之強，已閱千年，而君明臣良，代有其人」。⁸⁰張序列舉聖主賢臣、新教舊教之分爲法國國史關鍵之處，欽佩拿破崙「囊括宇宙，席捲天下」之「雄才大略」，⁸¹但以其抑鬱而終實屬咎由

⁷⁵ 李善蘭：〈《米利堅志》序〉，《米利堅志》，頁2b-3a。

⁷⁶ 潘光哲在討論『《華盛頓神話》的政治效果』時認爲此處「李善蘭的思考所至，是以間接譬喻的方式，啟示了他的讀者，美國這種『通國公舉、四年讓位之法』的制度，實在具有突破中國政治困局的優點和價值，頗有見地，參見潘光哲：《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臺北：三民書局，2006年），頁74。

⁷⁷ 木原元禮：〈《法蘭西志》後序〉，《法蘭西志》，頁1a。

⁷⁸ 木原元禮：〈《法蘭西志》後序〉，《法蘭西志》，頁2a。

⁷⁹ 木原元禮：〈《法蘭西志》後序〉，《法蘭西志》，頁3a。

⁸⁰ 張斯桂：〈《法蘭西志》序〉，《法蘭西志》，頁2a。

⁸¹ 張斯桂：〈《法蘭西志》序〉，《法蘭西志》，頁2b。

自取，感歎此後三世拿破崙「仍蹈故轍」。⁸²並評價此書敘述、描寫「杼軸從心，褒貶得體」，⁸³「讀之令人眉飛色舞」。⁸⁴沈氏誇讚岡氏與高橋一爲「良史」，一「通大義」，⁸⁵因而可以避免「舌人諳其語而拙於文，學士長於筆而昧於其字」⁸⁶的缺陷，翻譯此書「厥功偉矣」。⁸⁷他對法蘭西整體印象爲「於歐洲爲強國，雖壤土不廣，而勇悍好戰」，⁸⁸法人事蹟「足以資考鏡」，拿破崙之經歷「足以爲後世懲戒」。⁸⁹岡君、高橋氏譯書堪稱「識時務」之舉。中日兩國知識人士的序跋均以漢土歷史比附西洋，在三代之治的傳統框架中進行思考。相對而言，清人注重譯述的文采，但議論多浮於表面，較爲虛化，內容上不及日人所言深入透徹。

此外，《法蘭西志》卷內天頭附有日人重野安繹、藤野啟、野口弑、中村暫、萩原裕、木原元禮、河野通之與晚清文士葉松石等人讀後所添眉批。⁹⁰這些評點大致可分爲如下幾類：一是提煉概括文本所敘事件，標明重點，爲後人閱讀提供方便。全書首個眉批「克魯味稱法蘭西王」⁹¹是對本節標題的重複；其後「法王初戰勝西亞克勒」、⁹²「土耳其滅東羅馬」⁹³皆指出本書的主要敘述線索。二是對文本內容加

⁸² 張斯桂：《〈法蘭西志〉序》，《法蘭西志》，頁3a。

⁸³ 張斯桂：《〈法蘭西志〉序》，《法蘭西志》，頁3b-4a。

⁸⁴ 張斯桂：《〈法蘭西志〉序》，《法蘭西志》，頁4b。

⁸⁵ 沈文燾：《〈法蘭西志〉序》，《法蘭西志》，頁2a。

⁸⁶ 沈文燾：《〈法蘭西志〉序》，《法蘭西志》，頁1b。

⁸⁷ 沈文燾：《〈法蘭西志〉序》，《法蘭西志》，頁2a。

⁸⁸ 沈文燾：《〈法蘭西志〉序》，《法蘭西志》，頁2a。

⁸⁹ 沈文燾：《〈法蘭西志〉序》，《法蘭西志》，頁2b。

⁹⁰ 喬治忠認爲，《米利堅志》與《法蘭西志》「天頭加有標題解注，無疑是仿從《十八史略》七卷本體式」。見《〈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響》，收於氏著：《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頁431。筆者按，兩書卷內天頭所加者爲諸家評語，無法盡以標題解注概況，此種形式幾乎存在於岡氏所有史學與文學作品中，是否確定模仿《十八史略》有待商榷。

⁹¹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2a。

⁹²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2b。

⁹³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9b。

以闡發，以便讀者理解。如上冊卷末云：「我邦上古文明資於三韓，中古文明資於隋唐，慶元以來文明資於漢學盛行，近世文明則資於歐米。通交無非資於海外也，論時勢者當首着眼於此。」⁹⁴既簡要概括日本文明史，亦回應譯者對「歐土文明日開，實原於此」⁹⁵的質疑，同時還點明讀者應當著力關注之處。又如卷五指出「認米獨立，法國之一大義舉」，⁹⁶揭示出法國在美國獨立問題上的開明之舉。三是評價譯者的文學價值。如中村哲談及「伯弗納之戰」時，對譯筆簡潔生動讚不絕口：「短短二百言，一帝一王苦戰情狀，摸寫無遺。」⁹⁷又如在「格利西之敗」中，譯者的描寫繪聲繪色，曲折有致，讀之如臨其境：

是日日蝕，大雷雨。英王曰：「天助我也」。鼓噪而進。比兩軍接鋒，天忽晴。英王列大炮於陣前，吶喊聲齊發。法軍狼狽，潰死者三萬七千人，伏屍山積，列侯貴族，死亡殆盡。王與從者五人乘夜間行，達一壘。硝兵聞叩門聲，急出見，則王也，壘將大驚出迎。自有法國，無此大敗，世謂之格利西之敗。⁹⁸

眉批曰：「文極變幻之妙，不如此則不足寫此一大戰」，可謂甚得譯者之心。再如首卷論贊部分清人葉松石稱讚岡氏用語「文氣卓犖，得司馬氏之訣」，⁹⁹將其與太史公之歷史書寫相提並論。而書末天頭評點者的總結性評語更是不吝溢美之詞，將岡千仞的譯述文采與拿破崙的運籌帷幄等而觀之：「一枝筆，能取歐羅巴第一英雄，掀翻欺弄，不止盤丸。天爵之用筆，猶拿破崙之用兵，無堅不摧，真希代之偉觀。」¹⁰⁰四是自抒機杼，發表議論。如論及西土宗教與科學的關係時

⁹⁴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17a。

⁹⁵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17a。

⁹⁶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18b。

⁹⁷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12b-13a。

⁹⁸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2b-3a。

⁹⁹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12a。

¹⁰⁰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21b。

云：「西洋諸仁政皆成於教法，獨窮理學科不然。」¹⁰¹ 評點者尤喜東西並舉，如卷一將法國賢聖比附於日本明君：「克魯味王似我織田右府，查理曼似我豐太閤。」¹⁰² 卷三列舉中日法三國良王：「守成良王，我有仁德天皇，漢土有文帝，而歐洲則有路易九世，雖東征無功，不害爲良王。」¹⁰³ 又如比較漢歐不同軍事理念時稱「歐土人懸軍萬里，視死如歸，故膽略日大，竟至橫行五洲。漢土人常戒窮兵黷武，何爾怯」。¹⁰⁴ 再如河野通之又將路易十四與漢武帝兩相對比：「十四世路易銳意戰伐，威懾四鄰，曠度大略與漢武相類，而臨死遺訓，亦與輪台一詔如出一口，唯恨不得一霍光托遺業也。」¹⁰⁵

《米利堅志》、《法蘭西志》以外，《訥耳遜傳》卷首亦有明治日本人題辭作序。熾仁題辭贊曰：「偉勳盛功，一出忠赤」，強調訥耳遜將軍的功績與忠心。肝付大佐之序亦對其滿是溢美之辭：「英國訥耳遜之爲將也，專重信義，待下以仁惠，事上以忠盡，戒文弱，尙武勇，務實學，不談空理。」內田自引評價其「盛勳偉烈，磊落昂天地」。三人均不約而同地強調訥耳遜之忠勇兼備的英雄品格。

（二）岡氏譯著在晚清中國

張伯偉先生曾將採購、輸入、翻刻與餽贈概括爲東亞書籍交流的四個途徑。¹⁰⁶ 具體到明清東亞女性文學的書籍環流，更細化爲採訪、購買、輸入、餽贈、翻刻與編集六個方面。¹⁰⁷ 而岡氏譯著，除未完成的《英吉利志》外，均經歷了從「西史東漸」到「東書西傳」的環

¹⁰¹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6b。

¹⁰²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4b。

¹⁰³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18a。

¹⁰⁴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15a。

¹⁰⁵ 岡千仞：《法蘭西志》，頁11b-12a。

¹⁰⁶ 參見張伯偉：《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84-120。

¹⁰⁷ 參見張伯偉：《明清時期女性詩文集在東亞的環流》，《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頁95-106。

流過程。如果說，作為西史東漸，上文論及岡千仞漢譯西史的實踐線索較為清晰，那麼在東書西傳方面，對照張伯偉先生概括的途徑，再考慮到近代社會的實際情形，岡氏譯著在晚清中國主要經歷了翻刻、售賣、餽贈與改寫的流播過程，而有些情況下這些過程又是互相關聯的，以下將進行分析。

最先接觸到岡氏譯著的中國士人，除了曾為《米利堅志》與《法蘭西志》兩書作序的張斯桂、沈文燾等駐日外交官員外，還有1879年踏訪扶桑的民間文士王韜。在《扶桑遊記》中，他初次介紹岡千仞時便稱：「鹿門會（筆者按：當作曾）著《米志》、《法志》，於泰西情形，了然若指諸掌」，¹⁰⁸王韜此行曾攜帶自著，並拜託岡千仞代為售賣：

今奉上拙著《遯窟調言》八部（每部四十五錢），《甕牖餘談》八部（每部三十六錢），尤以速消為要，得金即擲之虛北也。¹⁰⁹

岡氏當然不願平白虛受，提出以《米利堅志》與《法蘭西志》兩書交換。王韜遊訪日光山前準備將書「裝箱寄回香港」，遂請求岡千仞「即飭人送」，並建議以所攜未售之書相易。¹¹⁰半月後又再次催促，¹¹¹翌日便收到《米利堅志》。¹¹²岡氏曾前後三次寄送兩志，僅前兩次所寄便多達「七十四部」。¹¹³王韜回到香港後，仍不忘代售岡氏兩志。甚至打算收於自己的譯述叢書之中，重新刊印：

《米志》、《法志》，弟寄至上海銷售，均以價昂，尚遲有待。弟擬將米、法兩志加入弟之所譯，重為刊行，何如？此千秋之盛

¹⁰⁸ 王韜撰，陳尙凡、任光亮校：《扶桑遊記·卷上》，頁412。

¹⁰⁹ 1879年7月28日王韜致岡千仞函，〈王韜遺墨〉，頁135。

¹¹⁰ 1879年7月31日王韜致岡千仞函，〈王韜遺墨〉，頁136。

¹¹¹ 1879年8月15日王韜致岡千仞函，〈王韜遺墨〉，頁136。

¹¹² 1879年8月16日王韜致岡千仞函，〈王韜遺墨〉，頁136。

¹¹³ 約清光緒五年（1879）七月中旬前王韜致岡千仞函，〈王韜遺墨〉，頁136。

事，不朽之鴻業也。¹¹⁴

王韜甚至化用曹丕《典論·論文》裡的名句「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來形容岡千仞的譯著，對其漢文譯筆的文學價值作出極高評價。王韜已將岡氏寄送的兩志悉數發往上海銷售，但稱因定價昂貴，銷路不佳，周轉較慢。而如果我們結合當時的近代化媒介，可以看到至少在1881年7月的《申報》上便已連續刊出售賣兩志的廣告：

《袖珍漢魏叢書》白紙十元，《萬選青錢文海》十元，《北繳彙編》三角五，《明末貳臣逆臣傳》五角，《鉛板艷史叢鈔》八角，《弢園尺牘》四角五，《新刊火器說略》四角，《日本雜事詩》四角，《普法戰紀》三元，《法蘭西國志》一元，《米利堅志》七角，《精校正續唐宋八大家文》皮紙印成、每部三元，《每渭長繪於越先賢高士傳》三元，《陳紉齋畫牘》四元，《中西算學集要》二元四角。諸君鑒賞者請至二馬路味三堂或寶善街北首醉六堂均可，城內醉六堂啟。¹¹⁵

雖然此段題作「新印書籍」，但兩志很可能還是前年岡氏寄送給王韜的和刻本。醉六堂爲其時上海當地一書商，頻頻在《申報》上刊登售書廣告，十數年後刊印《西學大成》叢書時將兩志翻刻本悉爲收錄。而於五年後，申報館直接刊出自家售賣兩志的廣告：

《普法戰紀》三元五角，《弢園文錄外編》六角，《瀛壖雜誌》五角，《法蘭西志》七角，《米利堅志》五角，《火器略說》二角六分，《校邠廬抗議》三角，《華陽散稿》三角，《娛親雅言》四角，《珊瑚舌筆談》四角，《蔣劍人詩詞集》白紙一元、竹紙八角，《藏名山房雜著》一元二角，《尊攘紀事》一元，《尊攘

¹¹⁴ 清光緒六年（1880）4月6日王韜致岡千仞函，〈王韜遺墨〉，頁139。

¹¹⁵ 〈新印書籍出售〉，《申報》第2933號，第5版，1881年7月2日；〈新印書籍出售〉，《申報》，第2947號，第6版，1881年7月16日。

《紀事補遺》六角，《西青散記》四角，《五海陬治游錄》三角，《芬陀利室詞話》一角六分，《曾文正公榮哀錄》六分。以上各書，申報館出售，滬上各書坊亦有。¹¹⁶

頗為有趣的是，兩志的價格分別較五年前降了兩至三角，若再聯繫同樣是在五年時間裡，王韜作品《普法戰紀》的售價反而上漲了五角，則兩志的降價行為可以坐實，其本身或許真與當年王韜所言情形一致。另外需要考慮的是，此時恰距岡千仞東歸不久，同樣出現在這份書單上的兩志，連同《藏名山房雜著》、《尊攘紀事》與《尊攘紀事補遺》三部岡氏著作，都是兩年前其遊華途中隨身攜帶，用以酬贈的：

余是游，齎《法蘭西志》、《米利堅志》、《尊攘紀事》各五十部，《紀事補遺》、《藏名山房雜著》各一百部，以充贈遺。而諸人多贈珍籍，得書一百四十三種。¹¹⁷

岡千仞將《法蘭西志》、《米利堅志》等自著贈送給諸多文士，一部分是王韜、張裕釗（1823-1894）（通過其子張沆）等在本國即已熟識的舊友，更多則為遊華期間結交的新知，既包括俞樾（1821-1906）、張燠綸（1846-1904）等民間儒士，也有如李鴻章（1823-1901）、盛宣懷（1844-1916）等主政官員。這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京師同文館總教席丁韞良。丁氏是當時在華掌握西學話語的重要人物，早年因為《米利堅志》，兩人即以文字結緣。此番見面，岡氏更是謙稱其譯書為本國歐學未開之時知曉域外大勢的窗口，目之為「洋人在中土譯西籍者」¹¹⁸ 第一，言語間甚是欽佩。岡氏心目中漢譯西籍的翻譯標準也可從二人在書籍酬贈的交談中補出：「敝邦歐學日開，譯書續出，唯其

¹¹⁶ 〈寄售書目〉，《申報》第4776號，第7版，1886年8月2日；〈寄售書目〉，《申報》第4779號，第10版，1886年8月5日。

¹¹⁷ 岡千仞撰，張明傑整理：《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178。

¹¹⁸ 岡千仞撰，張明傑整理：《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121。

人不文，故旨義不明。唯先生諸著，譯意穩妥，行文名譽。」¹¹⁹

在篇制與時限上，《法蘭西志》均較此前的《米利堅志》涵蓋範圍更廣。《米利堅志》共四卷，敘述三百餘年的美國歷史，聚焦於美國的獨立與共和政體，筆墨多集中在華盛頓一人身上。而《法蘭西志》比前書多出兩卷，跨越的時間亦長達兩千三百餘年，涉及法國民主、法制、軍備等方面，塑造的歷史人物如克魯味王、查理曼、路易十四、拿破崙均各具特色，使讀者印象深刻。

對於《法蘭西志》，岡千仞尤為得意，於其所著，特標此書，引以為傲，意在揭露法國之野心，警示主政者：「弟著漫然無足觀，唯法史首下筆。……異日生事東洋者必法也。……五強國中首譯法史，將使是責者所警也。」¹²⁰岡氏編寫《法蘭西志》極為用心，頗費苦功。書成之後，「為之設小宴」，¹²¹請求沈文燮等人賜序以「生光」。¹²²在與另一清國駐日公使館館員黃遵憲筆談時亦稱：「於此書刻苦，殆一夜發白者。為岡本氏《萬國》一樣之看，抹殺多少苦心者，有眼者必知之」，¹²³同時奉書以求評點。黃氏有拜讀過《法蘭西志》的記錄，表示日後一定向主政者推薦：「他日必以寄丁公，備採擇。」¹²⁴此外，黃氏亦「曾語紫詮以翻刻」，並盛讚岡氏所著「文筆雄深，若吾國有翻刻本，必當不脛而走」。¹²⁵岡千仞與黃遵憲在文學、歷史與思想等各個方面有著深切的交往，岡千仞大部分作品都曾得到黃遵憲的品評。岡千仞「是當時東亞中西思想文化傳播的重要使

¹¹⁹ 岡千仞撰，張明傑整理：《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121。

¹²⁰ 〈盛宣懷與岡千仞筆談〉，收於王爾敏、吳倫霓霞合編：《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頁502。

¹²¹ 劉雨珍編校：《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頁634。

¹²² 劉雨珍編校：《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頁634。

¹²³ 劉雨珍編校：《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頁639。

¹²⁴ 清光緒六年（1879）3月8日黃遵憲致岡千仞函，收於鄭海麟輯錄：〈黃遵憲遺墨〉，《近代中國》第9輯（1999年12月），頁149。

¹²⁵ 劉雨珍編校：《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頁639。

者之一」，「《法蘭西志》和《米利堅志》均是傳播新思想，開拓新視野的著作」，黃遵憲正是通過和岡千仞的交往而在思想上開始發生轉變。¹²⁶ 黃遵憲許多思想觀點如關於明治維新、倒幕志士等，多來自於岡氏著作，¹²⁷ 故能發出「形而上，孔孟之論至矣。形而下，歐米之學盡矣」¹²⁸ 的議論。

兩志，尤其是《法蘭西志》與王韜思想的轉變不無關係。¹²⁹ 在西學方面，王韜頗為留心法國史，不僅曾遠涉重洋，在香港期間還編譯有《普法戰紀》、《法國志略》等相關著作。他對《法蘭西志》青睞有加，並以此為資料來源，在日後重新修訂早年完成的《法國志略》。¹³⁰ 岡氏中國之旅途中贈出的兩志日後開始在晚清士人接受西學方面產生影響。袁昶晚年日記回憶《米利堅志》時，稱其為「各國史學堂必須購備者」。¹³¹ 黃慶澄 1893 年東遊扶桑，結識岡千仞，推崇其「米、法二史」，而認為岡氏「性嗜史學，長於辨才」。¹³²

在已知的岡氏四部譯著中，最先完成的兩志對中國知識界來說名

¹²⁶ 張應斌：〈黃遵憲思想的轉變與岡鹿門〉，《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5 期，頁 84-89。

¹²⁷ 鄭海麟：〈岡千仞與黃遵憲——明治前期中日文化交流最具學術思想性的一章〉，《學士》1996 年第 2 卷，頁 141。

¹²⁸ 岡千仞撰，張明傑整理：《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 54。

¹²⁹ 參見易惠莉：〈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近代中國》第 12 輯（2002 年 12 月），頁 168-243。

¹³⁰ 王韜稱《重訂法國志略》「取資於日本岡千仞之《法蘭西志》、岡本監輔之《萬國史記》，而益以《西國近世彙編》，不足則復取近時之日報，並采輯泰西述撰有關於法事者，以成此書。」王韜：《重訂法國志略·凡例》（上海：淞隱廬，清光緒庚寅年（1890）），頁 1a。《重訂法國志略》與《法蘭西志》同樣涵蓋一千五百年的法國歷史。關於兩書的關係，美國學者柯文（Paul A. Cohen）有精彩的論述，參見柯文撰，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79-85。

¹³¹ 袁昶：《毗邪臺山散人日記》，民國間抄本，頁 4276。

¹³² 黃慶澄撰，王曉秋校點，史鵬校訂：《東遊日記》，收於鍾叔和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長沙：嶽麓書社，1985 年），據清光緒甲午（1894）刊本整理，頁 367。

氣更大，這也與甲午戰後晚清知識人士對兩志的翻刻活動有關。兩志最早在「第一批留日學生抵達日本」¹³³的1896年被翻刻，皆收於湖南新學書局之「西史彙函」叢書，又見收於上海醉六堂之「西學大成」叢書。¹³⁴此外，《米利堅志》尙有1897年上海鴻文書局版求知齋主人輯「中西新學大全」本及1902年上海鴻寶書局「各國政治藝學分類全書」本等。¹³⁵

在晚清西學目錄類書籍中，我們也可看到對於岡氏譯著東瀛原刊本與中土翻刻本的著錄以及時人的相關評價。梁啟超《西學書目表》（1896）與趙惟熙《西學書目答問》（1901）均曾提及「東洋本」《米利堅志》。¹³⁶徐維則更是對兩志翻刻本發表己見，更加認可採取「紀事本末」體、「記載亦稱翔實」的《法蘭西志》，而以爲《米利堅志》「於政教沿革，風俗遷移罕有發明」，故「猶不如」前者。¹³⁷

此外，《訥耳遜傳》亦曾出現在晚清商務印書館的售書目錄中，後者出於經營目的不吝溢美之詞進行推介，稱「讀此者猶有興起之

¹³³ 實藤惠秀撰，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修訂譯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72。

¹³⁴ 徐維則稱「上海石印湖南本」，徐維則輯，顧燮光補：《增版東西學書錄》，收於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頁53。《法蘭西志》見收於「西史彙函」卷十二至十四，扉頁稱「仿日本板刊行」，無木原元禮跋，或緣於原書所刊字跡潦草，不易辨識。卷末有「星沙（梁昌駿、龍瑞麟）重校付刊」字樣。《米利堅志》見收於「西史彙函」卷十五至十六，扉頁亦稱「仿日本板刊行」。

¹³⁵ 參見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1815至1900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爲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342、343。

¹³⁶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中「《米利堅志》，岡千仞，日本刻本，三本，八角」，陳建華、曹淳亮主編：《廣州大典》（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頁350，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時務報館石印本影印，頁842；趙惟熙：《西學書目答問》政學第一史志學「《米利堅志》（三冊），日本岡千仞撰，東洋本」，熊月之主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2014年），頁572。此外，民國時期的《福建求治局采錄西學書目》史學類著錄有《米利堅志》，參見《福建求治局采錄西學書目》，山東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民國抄本。

¹³⁷ 徐維則輯，顧燮光補：《增版東西學書錄》，收於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頁53。

心」¹³⁸。晚清「頗受歡迎」¹³⁹的《新學書目提要》對「日本東京譯書彙編社本」《訥耳遜傳》的評述則較為公允：既肯定其「於讀史者固不無裨益」¹⁴⁰的長處，亦指出書中「鋪張其詞」、非可傳信、「無以資學者之參考」¹⁴¹等不足。而此後民國年間問世的《譯書經眼錄》對《訥耳遜傳》的提要則為《新學書目提要》相關信息之抄撮。¹⁴²

五、結語

綜其一生，岡千仞始終對西學持有濃厚興趣。他一直努力引介域外大勢的觀念，對西史東傳頗有引導之功，這最主要體現在其與他人合作的漢譯實踐上。現存岡氏譯著中保留了他獨到的譯述原則與歷史評價。另一方面，這些作品，尤其是岡氏來華前完稿的《米利堅志》與《法蘭西志》，也被不少明治與晚清士人閱讀，後者通過題序作跋、品評批點、重新刊印，乃至著書立說等形式反映自己對於新知識、新理念的接納、理解和反饋，同時這些文字也展示出讀者自身的文化背景與知識框架，以及岡氏譯著帶給他們的思想衝擊與知識轉型的可能。

通過討論，本文認為，岡千仞較為深厚的漢學修養是其能夠潤色修訂合作者所譯初稿的重要基礎，也是其譯著受到不少明治與晚清士人關注的基本條件之一。岡氏不滿於當時洋學者零丁破碎，全無體系，鬱澀難懂的翻譯現狀。其解決辦法有二：一為與合作者採取調適的翻譯策略（adaptation strategy），以求詳略得當，敘述有法，便於讀者通盤把握；二是選擇以漢文納西史，通過漢文翻譯、漢音構擬等

¹³⁸ 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上海書店，2005年），頁286。

¹³⁹ 熊月之主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頁8。

¹⁴⁰ 沈兆禕：《新學書目提要》，收於熊月之主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頁485。

¹⁴¹ 沈兆禕：《新學書目提要》，收於熊月之主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頁486。

¹⁴² 參見顧燮光：《譯書經眼錄》，收於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頁438。

形式對抗洋學盛行、全盤西化帶來的時代挑戰。在歷史事件與人物評價方面，他延續上法三代、推尊堯舜等儒家批評原則，又常將本邦先人與西方歷史人物相比附，推崇忠勇兼資的英雄史觀。近代中日士人對於岡氏譯著的序跋評點顯示出雙方在三代之治的傳統框架中進行思考與在肯定西方自由、民主與法治等先進制度上的共通。相對而言，清人注重譯述的文采，但議論多浮於表面，較為虛化，內容上不及日人所言深入透徹。岡氏譯著在晚清中國主要經歷了翻刻、售賣、餽贈與改寫的流播過程，而這些過程又常是互相關聯的。王韜將岡氏寄送的譯著悉數發往上海銷售，但因定價昂貴，銷路不佳。結合《申報》的記載可以知道，此後書商採取了降價的銷售策略。在已知的岡氏四部譯著中，最先完成的《米利堅志》與《法蘭西志》對中國知識界來說名氣更大，這也與甲午戰後晚清知識人士對兩志的翻刻活動有關。

徵引書目

- 《中西聞見錄》、《萬國公報》，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網址：
<http://58.194.172.12/rwt/CNBKSY/http/P75YPLUDN3SGX653F3SX85B/>，
檢索日期：西元2017年2月14日。
- 《申報》（影印本），上海：上海書店，1983年。
- 《福建求治局采錄西學書目》，山東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民國抄本。
- 三浦叶編：《明治の碩學》，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
- 下中邦彥編：《日本人名大事典》，收於《新撰大人名辭典・第二卷》，東京：平凡社，1939年。
- 千村芝溝譯，河野通之編，岡千仞校：《英吉利志》，舊雨社。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岡千仞舊藏資料目錄，網址：
http://www.library.metro.tokyo.jp/edo_tokyo/tokubun_guide/kaiage/tabid/994/Default.aspx，檢索日期：西元2017年2月14日。
- 山岡洋一：〈15年に數千點——明治初期の大翻時代〉，《翻譯通信》，2004年3月號，頁1-3。
- 川田剛：〈《米利堅志》序〉，收於岡千仞、河野通之同譯：《米利堅志》，東京：光啓社、博聞社，1873年。
- 內田成道、岡千仞共譯：《訥耳遜傳》，東京：土屋書店，1887年。
- 日下寬：〈《荃汀遺稿》序〉，收於河野通之撰，河野有編：《荃汀遺稿》，東京：大成社，1922年。
- 木原元禮：〈《法蘭西志》後序〉，收於高橋二郎譯述，岡千仞刪定：《法蘭西志》，東京：露月樓，1878年。
- 王 韜：《重訂法國志略》，上海：淞隱廬，光緒庚寅年（1890）。
- 王克非：《翻譯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年。
- 王爾敏、吳倫霓霞合編：《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 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 王韜撰，陳尚凡、任光亮校點：《扶桑遊記》，長沙：嶽麓書社，1982年。
- 合山林太郎：〈讀む阪谷朗廬〈舊雨社記〉—明治初期漢詩文壇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收於合山林太郎：《幕末・明治期における日本漢詩文の研究》，頁29-38，大阪：和泉書院，2014年。
- 宇野量介：《鹿門岡千仞の生涯》，東京：岡廣，1975年。
- 宋 雪：〈書評：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漢學研究》第33卷第2期，2015年6月，頁275-280。
- 杉村邦彦：〈楊守敬の歸國——岡千仞撰著《觀光紀游》を基にして〉，《書道文化》2007年第3期，頁15-37。
- 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己集下》，收於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14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
- 李 慶：《日本漢學史·第一部·起源和確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 沈兆禕：《新學書目提要》，收於熊月之主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
- 沈國威：〈「野蠻」考源〉，《東亞觀念史集刊》第3期，2012年12月，頁383-403。
- 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上海書店，2005年。
- 岡 濯：〈《荃汀遺稿》序〉，收於河野通之撰，河野有編：《荃汀遺稿》，東京：大成社，1922年。
- 岡千仞、河野通之同譯：《米利堅志》，東京：光啟社、博聞社，1873年。
- 岡千仞撰，岡百世編：《藏名山房文初集》，大崎町：岡百世，1920年。
- 岡千仞撰，張明傑整理：《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北京：

- 中華書局，2009年。
- 易惠莉：〈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1860-1870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近代中國》第12輯，2002年12月，頁168-243。
- 河野通之撰，河野有編：《荃汀遺稿》，東京：大成社，1922年。
- 柯文撰，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
- 徐佳貴：〈書評：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9期，2015年9月，頁189-197。
- 徐維則輯，顧燮光補：《增版東西學書錄》，收於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據清光緒十六年（1890）鉛印本影印。
- 袁昶：《毗邪臺山散人日記》，民國間抄本。
- 高橋二郎編：《昌平大學職員及同窗名簿》，東京：忠愛社，1893年。
- 高橋二郎譯述，岡千仞刪定：《法蘭西志》，東京：露月樓，1878年。
- 張伯偉：〈明清之際書籍環流與朝鮮女性詩文——以《蘭雪軒集》的編輯出版為中心〉，《漢字漢文研究》2015年第10號，頁95-106。
- 張伯偉：〈明清時期女性詩文集在東亞的環流〉，《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頁95-106。
- 張伯偉：〈書籍環流與東亞詩學——以《清脾錄》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2期，頁164-184。
- 張伯偉：《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張明傑：〈岡千仞游華及其所作遊記〉，收於岡千仞撰，張明傑整理：《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張斯桂：〈《法蘭西志》序〉，收於高橋二郎譯述，岡千仞刪定：《法蘭西志》，東京：露月樓，1878年。
- 張應斌：〈黃遵憲思想的轉變與岡鹿門〉，《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頁84-89。
-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二年

- (1896)時務報館石印本影印，陳建華、曹淳亮主編：《廣州大典》，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
- 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
- 陳捷：《人物往來與書籍流轉》，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喬治忠：《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
- 黃慶澄撰，王曉秋校點，史鵬校訂：《東遊日記》，收於鍾叔和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
- 葉楊曦：〈《法蘭西志》的漢文譯介與書籍流轉〉，《漢語言文學研究》2015年第2期，頁62-74。
- 葉楊曦：〈「藥石之語」：《觀光紀游》與岡千仞的中國觀〉，收於張伯偉主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9輯，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83-204。
- 葉楊曦：〈從「妄論國事」到「好意苦言」：《觀光紀游》在近現代中國的接受、評價及影響〉，收於張伯偉主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1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91-110。
- 鄒振環：〈《大英國志》與晚清國人對英國歷史的認識〉，《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頁40-49。
- 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1815至1900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爲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實藤惠秀撰，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修訂譯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 熊月之主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2014年。
- 趙惟熙：《西學書目答問》，收於熊月之主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2014年。
- 劉雨珍編校：《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 潘光哲：《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臺北：三民書局，2006年。
-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
- 鄭海麟：〈岡千仞與黃遵憲——明治前期中日文化交流最具學術思想性的一章〉，《學土》1996年第2卷，頁124-146。
- 鄭海麟輯錄：〈王韜遺墨〉、〈黃遵憲遺墨〉，《近代中國》第9輯，1999年12月，頁134-162。
- 館森鴻：〈《荃汀遺稿》後序〉，收於河野通之撰，河野有編：《荃汀遺稿》，東京：大成社，1922年。
- 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岡千仞舊藏資料目錄，網址：
http://www.library.metro.tokyo.jp/edo_tokyo/tokubun_guide/kaiage/tabid/994/Default.aspx，檢索日期：2017年2月14日。
- George, Payn Quackenbos. *Prim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D.Appleton & Co., 1864.
- Robert Southey. *The Life of Horatio, Lord Viscount Nelson*. London: Printed for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841.